

苏联报刊反华言论

第四集

世界知識出版社

苏联报刊反华言论

第四集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年·北京

苏联报刊反华言论

第四集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五)1.30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9 $\frac{1}{2}$ · 字数 223,000

1964年5月第一版 1964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723

編輯部說明

1963年7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給各級党組織和全体黨員的公开信。以后，苏共领导人就把他們的宣傳机器开动起来，明目張胆地进行大規模的反华宣傳运动。据不完全統計，到11月30日，在苏联二十六种中央級报刊和二十三种地方报刊上，就发表了社論、文章、小品文、讀者来信等等各种各样反华材料两千多篇。这些东西又多又濫，又臭又长，內容荒謬絕倫，言詞粗野恶毒，造謠誣蔑，无所不用其极。他們甚至不惜抄襲帝国主义反共机关編写的文理不通的小册子上的陈腔濫調，翻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过去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謾言来攻击中国。

为了使我們的黨員，我們的人民，了解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了解苏共领导怎样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的《人民日报》曾經不惜篇幅，将苏联报刊上最有代表性的反华材料陸續发表，并且奉劝我們的讀者耐心看下去。我們一直认为，像这样奇

妙的反面教材，如不充分加以利用，实在可惜。无奈这些东西数量过大，我們报纸的篇幅毕竟有限，所以只好另想办法，将苏联二十六种中央級报刊所发表的反华社論、編輯部文章、評論和文章，輯为专集，分册出版，以供讀者閱讀利用，并使此种史料不致湮沒。

本书第四集包括 1963 年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31 日的材料，共計三十二篇。书中的小标题、異体字和着重記号等等，都是原文发表时就有的。

目 录

斯·沃洛金：	
一条腿的平衡.....	1
尔·符·维亚特金、斯·勒·季赫文斯基：	
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中的一些問題.....	6
勃·列伊勃戎：	
充当个人迷信辯護士的不光彩角色.....	32
《共产党人》杂志社論：	
偉大的十月(节譯).....	45
《共产党人》杂志編輯部文章：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基础.....	48
符·叶夫多基莫夫：	
左傾机会主义——馬克思主义的敌人.....	100
符·科里奧諾夫：	
共产党人对历史的义务和責任.....	117
《新时代》杂志社論：	
一年过去了(节譯).....	132
阿·鮑文：	
革命过程与和平共处.....	134
姆·烏克拉英切夫：	
理論上的教条主义、实践中的冒險主义.....	143
叶·馬涅維奇：	
劳动人民的个人財產(节譯).....	149

勃·朱罗什尼欽科：	
社会主义国家經濟发展的重要因素(节譯)·····	151
叶·斯捷潘諾夫：	
团結不合分裂主义分子的口味·····	154
勃·貝克納扎尔—尤茲巴謝夫：	
非洲的火山和北京的鞭炮·····	161
米尔佐·图尔森—扎杰：	
完全孤立·····	173
姆·庫尔甘采夫：	
誠实的先人和弄虛作假的后代·····	178
勃·加弗罗夫：	
和平、独立、社会主义(节譯)·····	182
亚·伊万諾夫、尤·米哈伊洛夫：	
中国經濟中的“大跃进”及其后果·····	187
格·卡尔欣：	
无产階級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經濟·····	193
伊·格拉戈列夫、符·拉里昂諾夫：	
和平共处与苏联国防威力·····	207
弗·波利特金、普·赫梅洛夫：	
貿易是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节譯)·····	221
叶·茹科夫：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說：我們要持久的	
和平！(节譯)·····	222
阿·米洛維多夫：	
普罗米修斯的继承人(节譯)·····	227
恩·法捷耶夫：	
經互会成員国正在加强經濟合作(节譯)·····	230

阿·加尔金：	
现代战争中的群众和技术装备·····	238
斯·涅斯捷罗夫：	
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手腕(节译)·····	255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评论：	
目前的世界政治问题(节译)·····	261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	
我們的反駁·····	271
《建筑报》社論：	
我們的起重機矗立在国外(节译)·····	278
普·特里弗年科夫：	
战争与政策·····	279
《政治自学》杂志：	
問題解答(节译)·····	290
符·馬尔科夫：	
未来属于共产主义(节译)·····	292

一条腿的平衡

在中国领导人“自力更生”口号后面隐藏着什么？

斯·沃洛金

在中国领导人企图用以哗众取宠的理论“发明”中，“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他们还坚持要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也使用他们的这个“普遍”药方。

让我们来试分析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中国领导人需要这种理论的目的何在？这种理论后面又隐藏着什么企图（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

尽人皆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是，在每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首先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及其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事情。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是在这个原理的基础上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声明中指出：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是最大限度地运用一切内部资源和潜力以顺利发展经济建设。

在恢复时期和进一步扩大经济建设的进程中，中国人民在克服中国长时期所遗留下的经济落后、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

在那些年代里，中国曾经同苏联及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其他各国在完全平等、互利和真正同志式的互助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合作，这种经济合作在巩固中国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所有领导人曾多次指出过苏联的兄弟般的、无私的援助的意义。虽然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无疑也是首先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实现的，但是看来，在一定时期以前，这些领导人是不需要“自力更生”这个口号的。然而以后事情又怎样呢？

中国领导人在开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当代根本问题上的方针后，便展开了对苏联共产党及其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其他兄弟党的进攻。他们在广泛的范围内实行旨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际活动。

中国领导除了需要其他的教条主义诽谤武器以外，还需要“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原因正在这里。这个口号是1962年9月在中共十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来的。但是，在这个本身不会引起异议的论点中包含有极不正确的内容。

中国领导人提出“自力更生”这个口号，为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致，反对国际社会主义分工以及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他们坚持分离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把每个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经济有限性的概念和某种自给自足的、互相孤立的民族经济共存的概念强加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把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仅限于贸易。

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莫斯科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各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所以获得成就，是由于根据每个国家的历史特点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正确地运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是由于这些国家人民的努力，由于他们紧密的兄弟般的合作和国际主义的相互援助，首先是由于苏联的兄弟般的国际主义的援助。

社会主义各国发展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它们获得成就和成绩的最重要的国际条件是：相互援助和相互支持，利用社会主义阵营

各国团结一致的一切优越性。”(黑体是我标的。——作者)中共代表在这个声明上也签了字。

但是,中国领导人现在把自己的“自力更生”方针同社会主义各国越来越紧密的接近和经济合作对立起来,他们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其他各国进行公开的诬蔑诽谤和攻击。

例如,一个中国的主要领导人颇为笨拙地掩饰自己的暗示,毫不害羞地公然说什么“某些人”“不是认真地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是真正地希望通过有关方面所需要的和互利的国际劳动分工和生产合作来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他们只是在漂亮的幌子下效法资本主义国家,在相互关系中损人利己,阻碍着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使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他们,在政治上受他们控制。”

这真是诽谤和忘恩负义的杰作!难道中国领导人当真期望能找到头脑如此简单的人,他们会相信中共领导人把自己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合作置于完全停止的边缘,才是“真正地”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吗?

按照他们的逻辑,苏联在一百九十八项奠定现代中国工业基础的大型工业企业的建设过程中提供了空前大规模的援助,交付了二万一千套以上的科学技术资料,往中国派遣了一万多名优秀的苏联专家去帮助他们进行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给数以千计的中国大学生、工程师和工人提供了在苏联的高等学校和苏联企业中受高等教育和进行生产实习的机会,因而苏联就“妨碍”了中国发展独立经济。

如此荒谬和忘恩负义的言论在北京竟被当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现”来加以大吹大擂。

中国领导人竟然把资本主义一体化法则和国际社会主义分工的崇高目的等同起来。

那么，中共领导人提出“自力更生”的口号目的何在呢？显然，是妄想离间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妨碍他们进一步接近和进行互利的合作，削弱他们的紧密友谊并分裂社会主义阵营。

中国领导人把自己同各兄弟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转到中国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之间的国家关系上去。他们甚至不知羞耻地公然宣布这一点。《新德意志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早在1961年6月，中共领导人之一就同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谈到，中国“在近几年中将只同那些支持中国意识形态观念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

中国领导人竭力试图把中国人民同一贯执行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共同路线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隔离开来。最近三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缩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

中国政府片面撕毁了原先签订的协议和合同，因而给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例如，由于中国方面的过错，从1961年起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贸易开始急剧下降，尽管捷方为了保持和增加换货量给中国创造了各种十分有利的条件，1963年换货总额缩减为不到1959年水平的16%。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民经济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由于中国方面停止了大量的物资供应和取消了大批已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企业进行安排的订货，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它的后果至今仍影响着该国的经济。而同时中国政府却颇为努力地同西德发展经济关系。中国领导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实践中就是这样！

最近两三年来，由于中国方面的过错，保加利亚同中国的贸易额大约缩减了五分之四。

中国领导人正是以“自力更生”的口号来掩盖自己这种孤立主义的实践活动的，其目的是要断絕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經濟联系。但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承认使本国經濟和人民遭受損失是爱国主义，而断絕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联系和使它們的經濟蒙受損失是无产階級国际主义，那时才能相信他們的伪善的咒語：“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既是爱国主义的，也是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

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問題上所持的完全是另一种立場。

在經互会成員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書記和政府首脑會議的公报中着重指出：“會議参加者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个国家内部的資源和可能性，在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的基础上全力促使經濟联系的进一步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結和一致。

进一步加强国际社会主义分工，扩大生产专业化和协作、換貨和科学技术合作，这对于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來說都是极端重要的。”

中国领导人用虚伪的“自力更生”的口号来掩盖自己的閉关自守的、孤立于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大家庭之外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方针，是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根本相違背的。这个方针导致不合理的和毫无必要的社会劳动的浪費，降低社会生产的增长速度。它的目的是分裂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是同列宁主义的思想 and 实践不相容的。

（釋自 1963 年 10 月 16 日《共青团真理报》）

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 中的一些問題

尔·符·維亚特金、斯·勒·季赫文斯基

近几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領域中出現了一些錯誤傾向，这些錯誤傾向是同中共領導总的錯誤的政治方針，即背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商定的路綫有密切关系的。因此有必要批判地探討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战綫上的状况，客观地評價它的发展結果，并指出基本的錯誤傾向。

显然，要在一篇文章里相当充分地闡明所有这些問題是不可能的。其所以不可能，首先是因为历史学是具有多种結構的現象，它包括很多部門、很多輔助学科，以及各个时代的广泛問題。此外，反映重大研究著作、专题著作中的这些或那些概念，是长期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根据个别論文和言論来判断有些什么新的观点和傾向。最后，由于中国方面的过錯而产生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附帶情况，即寄往苏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著作的大大縮减，地方出版物和大学学报的寄送几乎完全停止，中国历史学家同苏联学者在科学上的接触的削弱，也妨碍我們十分全面地描繪出最近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情况。

历史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文科学总的体系中占着重要地位。对历史学來說，也和对其他科学部門一样，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它开辟了广闊的天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十年中，历史学无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不仅表现在历史方面的研究所和机构的数量增加以及几百种各种各样內容的历史书籍的出版

上，而且还表现在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为从事科学工作的武器这一事实上。由此可见，这是中国历史学发展上的一个崭新阶段，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个别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奠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的巩固和发展的阶段。

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学家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在古代史方面——根据新的考古资料研究中国文明历史的上古阶段，初期阶级社会（殷、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史，古代社会的分期问题；在中世纪史方面——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史、民族史；在近代史方面——中国人民反对压迫者的一些最大的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帝国主义侵华史；在现代史方面——中国共产党史、民族解放战争史。中国思想史和哲学思想史的题目是很全面的。在上面指出的这许多方面，可以举出一些重大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丰富了我們关于各个时期中国史的知识。苏联科学界对于所有这些著作是很清楚的。其中许多著作已译成了俄文，或者在苏联定期刊物上作过评介。

說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比旧的、半殖民地的国民党中国的情况进步时，必须注意到作为它的起点的科学发展的一般水平非常之低和在它发展道路上所存在的客观困难。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教授1962年在巴基斯坦历史学家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当然，新中国历史科学的成就，还不能使我們感到满意。有些工作还刚刚开始或只是建立了初步的基础。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①

现在中国很大一部分最熟练的历史学家还是在旧中国或者在资本主义国家受过教育的学者。因此在他們的许多著作中保存着

① 《历史研究》杂志1962年第2期第5頁。

旧学派傳統的影响，純粹按朝代的方法研究历史，仅仅重視古文的語文学的分析，一味注釋或者走另一极端——过份的社会学化和公式主义，缺乏必要的历史对比和結論，这不是偶然的。在許多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对于世界历史学的优秀成果不够熟悉。革命胜利后培养起来的青年学者，并不总是能够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得到必要的指导和帮助。然而，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的弱点和困难，在新中国年輕的历史学发展的过程中逐漸地得到了克服。在1949至1958年这段时期內，扩大了对历史学干部的培养，推广了集体工作的方式，对科学工作者进行了政治教育，苏联学者和其他国家进步历史学家的許多著作譯成了中文，这就給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論以直接影响。

苏联学者一向关心中国进步历史学的发展，对它的成就感到兄弟般的喜悅。人民革命胜利后，曾經訪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帮助了新中国科学的形成。苏联用俄文出版了郭沫若、范文瀾、陈伯达、胡绳、华崗、尙钺和其他历史学家的許多巨著，以及文献集和书目等。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按期出版介紹《現代中国社会科学著作》的文集。在《历史問題》、《古代史通报》、《亚非人民》杂志和其他期刊上，刊载有关中国史的論文和新中国出版物的評介。在苏联历史学家的研究著作中，首先是在我国的汉学家的著作中，广泛地利用了中国学者的原著，作出了反映某些問題的研究情况的史学概述。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四、五年来的情况，正如事实所表明的，却延緩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当然經濟困难不能不在这方面起一定的作用，因为經濟困难大大地加强了知識分子的緊張程度，使他們不能把力量用在学术工作上。但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战綫的情况更加严重的是这些年来科学机构中所形成的一般政治空气。1959—1962年期间，完成的学术著作的数量大大减

少，学术著作出版计划被打乱以及其他一些事实，是不能用任何别的东西来解释的（例如，在历史方面 1959 年出版了五百二十八本书，1960 年是二百六十本，1962 年大约是一百五十本）。一系列期刊停止出版了，计划在共和国十周年出版的、由郭沫若主编的《中国通史》这部集体的总结性著作没有出版，等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近几年实行的总的错误路线，以及现在存在的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对苏共、对苏联进行敌意攻击的气氛，对思想战线的一个重要部门——历史学的状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些过程反映在历史方面的出版物中，它们或者表现为对苏共纲领中的论点进行公开攻击，或者表现为某些歪曲和篡改，表现为贩运教条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露骨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观点。在历史杂志的篇幅中，任何提到苏联科学成就的话逐渐不见了（例如，在中央历史杂志《历史研究》的本年各期中，报道国外尤其是苏联历史学家的最重要著作的大事记不见了）。在具体的历史研究领域里，这种政策和实践会导致什么结果，如果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这些或那些问题是怎样解释的，就会得到最好的了解。从大量的问题中，我们只来谈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解释世界史的问题，历史过程中一般和特殊的相互关系；蒙古和满族的征服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近代史问题及其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联系。

* * *

对世界史的研究，在中国开始得比较晚。中世纪后期中国封建统治者造成的长期的人为的隔绝状态，妨碍了中国对世界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在十九到二十世纪，中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这样虽然终止了隔绝状态，但导致了殖民列强的资产阶级学术的渗入，这种学术执行了为殖民主义辩护的社会要求；追随资产阶级学术的是近代的头一批历史学家康有为、梁启超、严